

評論

《文化研究》第三十期（2020年春季）：184-203

評周麗卿《探索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 〈新青年〉與民初的政治、社會思潮》*

A Review of Li-Qing Zhou's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New Youth an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s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王琛**

Chen WANG

一、前言

《新青年》作為中國現代性轉向的重要文本，向來是學術界、思想界研究的重點。既有的研究中大多數都是偏重於思想啓蒙的闡釋路徑，最近的研究中對此有些突破（王汎森2001；羅志田2006；林宏志2009；汪暉2009, 2011, 2015；羅崗2015），但仍然有待進一步發揮。周麗卿的《探索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新青年〉與民初的政治、社會思潮》便是循著政治、社會、思潮之間互動而展開的，可謂是對《新青年》研究的最新力作。本書將《新青年》作為一個動態文本，置於清末民初的政治轉型——從帝制時代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大背景下進行思考（周麗卿2016：19-20）。以此呈現出《新青年》與民初政治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力圖揭示其對現代中國政治形式的探索與實踐，不局限於思想文化啓蒙。這是貫穿全書的一條軸

投稿日期：2019年3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6月12日。

* 本文感謝《文化研究》審查委員對文中細節部分的修改意見。

** 王琛，先後就讀於安徽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中國大陸獨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主要研究領域：中國近代思想史。

聯絡方式：1658922890@qq.com。

輪，也是相比較既有的研究最具沖擊力之處。

當然，作者的這種研究方式也有一定的不足，在充分肯定作者的學術貢獻時也應檢討其缺失。本文質疑的主要基礎：一是蘇俄革命以及它對1920年代中國的影響。關於俄國社會的轉軌路徑以及這種轉型對中國的影響，秦暉先生在這方面頗有研究，提出不少真知灼見。他的觀點固然不必完全去贊成，如秦暉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中爲了迎合他提出的蘇俄對1920年代中國的影響，認爲新文化運動的前期（1915至1919年）和後期（1920年以後）並不沖突，筆者就不大贊成。但是筆者依然認爲秦暉的觀點絕不可以忽視，作者在本書中談到俄國革命時幾乎未曾引用和評論過秦暉的著作，以致在一些重要問題的認知上存在偏頗，如作者將列寧主義和經典馬克思主義混爲一談，把列寧主義主義中才有的，誤認爲是馬克思的，秦暉通過多年的研究表明兩者差異很大，也是筆者贊成的。作者也將1920年代中國社會思潮簡單化，都歸結於「救亡」和民族主義，忽視了其它因素的影響，秦暉的研究可以補充作者的觀點。

此外，秦暉對現代政治理論有著不同於常人的論述，如認爲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並非人們通常想像的那麼對立等等，這也是筆者贊成的。但是作者沒有認識到，反而在書中認爲兩者對立。秦暉的這些認識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新文化運動及身處其中的主要人物的思想。因而筆者在文中對作者這方面的不足進行了糾偏。

二是全面掌握和解讀史料，不是爲了適應某個主題而進行切分。因此，必須注重《新青年》、《努力》等文獻在有關問題上敘述的完整性，而不是像作者僅那樣注重《新青年》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同一性，而是同時也關注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再者，必須展現新文化運動中主要人物思想的複雜性。例如陳獨秀在五四後期的思想並非如通常論者（包括作者本人）認爲的那樣清晰，以爲他轉向馬列主義後就一直是激進的；事實上，他的形象具有不確定性和混雜性。同樣的，除了像作者一樣關注《努力》中注重政治的一面，也必須還要關注它的主要創辦人對思想文藝的重視，以此發現胡適等人的思想，在政治熱下依然具有不變的一面，強調的重心

還與之前的一致，都在思想文藝方面。這樣著眼可以補充作者因為過於著重政治、社會、思潮互動時所忽略的部分，以此彰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複雜性和多面相。

二、學術貢獻

作者在書中以1919年作為「界限」，認為1919年之前，中國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帝制復辟和共和國延續的問題。此時《新青年》同仁以激進文化變革進行思想啓蒙，同時介入社會、政治、時政問題。《新青年》的文化運動與民初的政治之間具有複雜的互動關聯，以此作為主線審視當時重要的時政：「倫理革命的孔教問題」、「文學革命的文白之爭」、「女權論述」分別對應著孔教入憲與張勳復辟、林紓的政治符碼與政治力量介入、國家法律與舊派文化的合謀（*ibid.*: 109, 165）。因當時對言論出版並不自由，只能通過文學、倫理、女權等非政治領域拓展論述空間。《新青年》介入時政有兩面策略：「一方面是破壞性的文化改革，一方面是建設性的啓迪共和民主思想」（*ibid.*: 111）。《新青年》倡導「民主」、「自由」，是源於抵抗袁世凱專權，也含有對改組後的中華革命黨領袖專權的不滿。它與民初的無政府主義一樣，強調人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注重以道德、文化為革命的內涵。後來兩者結合，成為五四運動前夕，「抵抗國家政府的激進政治勢力潛流」（*ibid.*: 165）。這股暗流在以後進一步擴大。

1919年之後主要面臨著國家主權問題，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五四愛國運動、俄國第一次對華宣言三件外交政治大事，「造成轉轍器的功用」，使得原來傾向體制內改革的《新青年》同仁轉向體制外的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ibid.*: 167, 230）。「西方」認同的分裂，使得解決中國問題的不同路線浮出水面。當時的知識青年對軍閥政府的失望，加上世界性的潮流推波助瀾，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如雨後春筍般湧出（*ibid.*: 167, 230-231）。社會主義思潮成為當時知識份子救濟中國的藥方，形成三大社會主義潮流：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改良主義。他們對中國國情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有著不同考量和判斷，引發解決中國問題的不

同思考模式，背後更大的問題是選擇中國未來的不同道路（ibid.: 271）。

《新青年》內部急劇分化，陳獨秀和李大釗轉向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並與國民黨進一步合流，形成日後洶湧澎湃的國民革命勢力。重視組織力量、善用群眾運動，打倒列強除軍閥，再造革命。魯迅、周作人兄弟認為中國根本問題不在政體和制度，而是在於「人心」的轉變。他們主張思想文藝啓蒙，來改造社會和國民性，通過「文學實踐來達成『文學救國』的目的」（ibid.: 294），俄國文學是其效仿的對象。不過《新青年》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允許他們實現自己的夙願，周氏兄弟不得不成立文學研究會，繼續文學革命。胡適和張慰慈等自由主義者主張「好人政府」，通過「上層菁英的政治改革，影響下層的社會，以制度的實踐作為民主啓蒙」（ibid.: 274）。他們認為英美的制度啓蒙才是關鍵，但是制度改變有賴於當權者的支持，作為當權者的軍閥又使得「好人政府」垮臺，「聯省自治」失敗。這種強調一點一滴式改革，在那動蕩不安的時代不被青睞（ibid.: 312）。此時的《新青年》還是多元思潮並存，其同人相互競逐，各種勢力通過各種途徑探索政治走向的多種可能性。只是在最後馬列主義成為時代「黑馬」，領跑此後的政治走向。

在作者的筆下，《新青年》已經不是一本思想啓蒙的刊物，而是五四一代漫長而又曲折的政治探索之路。「當我們將論述的背景從思想啓蒙調動置換為政治轉型，那麼《新青年》也許就可以成為一個窗口，提供我們一個看待清末民初的中國，從帝制走向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ibid.: 319）。並且作者還認為這種轉型可以與其它東亞國家（日本、韓國）作對比，從而看出民初中國政治轉型中所展示的特殊性與潛在的普世性。

以上是本書給筆者帶來的新知，下面是筆者對本書的一些質疑。

三、存疑之一：歷史背景應進一步鋪陳

作者對時代背景的鋪陳構成本書的最大特色，將單個文本進行「微言大義」式闡發。但是在筆者看來還有三點要補充：一是在「文白之爭」中

作者注意到了錢玄同和劉半農唱雙簧戲有著吸引輿論效果之效（*ibid.*: 81, 89），卻沒有明確說這是因為之前《新青年》幾乎到了辦不下去的地步，在陳獨秀的苦苦哀求之下想出的法子，才讓刊物得以勉強度日。白話文提倡最初只是限定在狹小的圈子內，如「『無物之陣』（魯迅語）一般的主流文化界根本不以為然，劉半農當年就曾慨歎『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魯迅也曾在《吶喊·自序》感慨說：『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正是因為不被關注，所以才有錢玄同、劉半農的『雙簧信』事件，也才有魯迅的『掀屋頂』論」（商昌寶2015）。這一點應當說明，以便更好地呈現《新青年》是動態文本這個核心主題。

二是在敘述一戰以後陳獨秀與社會改良主義者的爭論和角力中，作者注意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和俄國馬列主義的不同（*ibid.*: 224-228），也提到區聲白對列寧（Lenin）專制的鞭撻（*ibid.*: 240-249），卻沒有明確提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經過蘇俄轉手後是如何異化的。因為陳獨秀等人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是從俄國（特別是列寧）那裡而來，而經典馬克思主義在俄國被民粹主義化。俄國民粹主義的核心思想「人民專制」被列寧主義高度強化，形成了所謂的「超民粹主義」現象。列寧極端反對社會民主派的主張，把馬克思（Karl Marx）所說的過渡性「半國家」變成利維坦式的「超國家」，把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原來主張對付資產階級暴力的手段變成了鎮壓資產階級自由、議會、民主的手段（秦暉2013: 120）。列寧在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改革後極力強調「土地國有化」，重建新的「公社世界」，比傳統公社更具束縛力、更加壓抑個性（卞悟1997），並在以後史達林時代推到極端，以「全俄大公社」取代傳統小公社、以集體農莊消滅村莊（蘇文1997）。列寧與馬克思的思想差異甚大，¹作者對此有所忽略。相反，作者引用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中對馬克

1 關於列寧是如何扭曲馬克思思想的，張朋園在《從民權到威權》中也有一些論述（張朋園2015: 39-46, 144, 154）。五四運動的當事者胡適也注意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與蘇俄模式是不同的，他認為前者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產兒」，終生為自由而奮鬥，後者是鐵的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的態度，打壓異己思想，與五四前後提倡的自由主義背道而馳（胡適2013a）。

思的批判，認為陳獨秀在〈談政治〉中的主張與馬克思的思想相類似（周麗卿 2016: 271-272）。揆諸史實，陳獨秀接受的列寧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是很不相同的。

三是在論述1920年代《新青年》等刊物對時代思潮的反應時，作者認為這是在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下，當年的知識份子探索不同的救國之路（*ibid.*: 234, 315, 321-330）。但是這種解釋似乎將各種思潮的成分簡單化了，筆者認為不能否認有民族主義、救國傾向，可也不能忽視其它傾向。《新青年》左轉後接受的列寧主義，是無視民族主義、救亡的。列寧在一戰期間是非常排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革命護國主義」，主張變「外戰為內戰」，推翻民主派的臨時政府（秦暉2017），這種不顧本國實際利益的言行與民族主義相差太遠。受列寧主義影響而激進化的1920年代《新青年》同仁，也是無視當時的國家利益。1921-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將巴黎和會上割讓的中國國家權益相當程度上進行了糾正，中國收回了山東權益，「二十一條」、「民四條約」也名存實亡，並在關稅自主、收回租借地、限制和取消治外法權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進展。

但左轉後的《新青年》同仁對此種「救亡」行為卻非常冷漠（秦暉2015），²而一味追求蘇俄模式。顯然，說《新青年》接受馬列主義只是出於「救亡」、「民族主義」訴求是過於簡單化了，但作者的確這麼認為的，即「以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向導》屢屢指向外侮來看，民族解放的精神結合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人所觀察到的實際政治現狀中，謀求一條國族生存之路」、「民族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結合」（周麗卿2016: 266）。如前所說，這麼講並不是否認當時有民族主義、救國傾向，正如作者已注意到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複雜關聯有待進一步探討，而是補充作者說的1920年代思潮的多元性（*ibid.*: 231），以及中國未來選擇的各種可能性（*ibid.*: 331）。

2 秦暉對「五四」的認知，尤其對新文化運動在1915至1919年的形態論證筆者不太贊同，但是對20世紀20年代的認識筆者部分贊成。

四、存疑之二：應更注重《新青年》文本內容

作者過於重視《新青年》與社會思潮、時政的互動，反而有意無意間忽略了《新青年》文本本身的內容。在說到1919年之前無政府主義與《新青年》的關係時，作者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看法，認為兩者不是互不相干的不同力量（*ibid.*: 141）。這無疑是個新見解，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兩者的關係。但是卻沒有注意到兩者的不同性，作者在書中已經說到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由的絕對性，即不要法律、廢除政府，「政府」為「剝奪自由擾亂和平之毒物」（*ibid.*: 146）。但是卻沒有談到陳獨秀、高一涵對自由的具體看法，與之對照。在他們的邏輯中自由和法律密切相關，陳獨秀就認為現代國家的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都是為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利與幸福。「思想言論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在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若與個人利益相沖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陳獨秀1915）。這種西方式的個人主義與中國家族宗法制度不能相容，家族制度損壞個人自尊獨立之人格、窒息個人意志之自由、剝奪個人法律上之平等權利、養成依賴性戕害個人之生產力。

高一涵將自由分為三種：絕對有自由、絕對無自由、限制自由。他主要認同限制自由，即自由要出自國家，國家不賜予自由權利，則小己無自由，「定自由之範圍，建立自由之境界，而又為之保護其享自由之樂，皆國家職責」。接著他又根據黎高克的理論，將自由分為「天然自由」和「法定自由」，「天然自由」是盧梭所主張的「人生而自由者也，及相約而為國，則犧牲其自由之一部」。自由之性是天生所有，非國家賜予，「即精神上之自由，而不為法律所拘束者」（高一涵1915）。高一涵所認同的自由是法定自由。在這篇文章中他還認為要尊重自我之自由，必要尊重他人之自由，否則自身權利自由也不可得。政府不能抹殺人民的言論自由，人民之間也不能相互抹殺自由言論權。

這一切難道不與無政府式自由主義相差太遠了麼？

作者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乃至最後的結論中論述陳獨秀轉向馬列主義時，給人一種陳獨秀在五四後期的思想非常清晰之感（周麗卿2016: 169-331）。然而作者卻沒有注意到在〈談政治〉一文發表後，陳氏還有其它言論。陳獨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2號中就說：

輿論就是群眾心理底表現，群眾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輿論也是盲目的。古今來這種盲目的輿論，合理的固然成就過事功，不合理的也造過許多罪惡。反抗輿論比造成輿論更重要而卻更難。投合群眾心理或激起群眾恐慌的幾句話，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強大的輿論；至於公然反抗輿論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會底進步或救出社會底危險，都需要有大膽反抗輿論的人，因為盲目的輿論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時中國底社會裏，正缺乏有公然大膽反抗輿論的勇氣之人！（陳獨秀1921）

這種對群眾無意識舉動的反抗是一種典型的自由主義幽暗意識。所以，羅志田在談到陳獨秀在五四後期的思想時就曾說，陳獨秀並不像後來的研究者強調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差別，他更注重的是兩者互補的一面而非其對立，他敏銳地感覺到杜威（John Dewey）等人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是親近的。陳獨秀強調「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這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表達（羅志田2014: 191）。³

作者又認為陳獨秀「從『公理戰勝強權』到『強力擁護公理』，『強權』從負面的軍國主義逐漸轉為國家強盛的實力」（周麗卿2016: 217），如果單獨看這一句話確實是軍國主義的強權在陳的思想中具有正面意義，但與其它文獻對比似乎不是如此。陳獨秀反對軍國主義的強權是具有連貫性的。他在1919年就說過：「受過軍國侵略主義痛苦的人，當然拋棄軍國侵略主義」（陳獨秀1984d）；又說少數野心家操縱政權，實行大權政治

3 關於陳獨秀在五四後期的自由主義幽暗意識的表現，筆者在此處還可以做個簡要的補充。在1922年的非宗教運動中陳獨秀在致周作人、錢玄同等人信時依然注重個人自由，認為不論何種學說思想（包括基督教），都不能定於一尊，人們可以反對它，也可以贊成它。個人之反對某種學說、思想，不會破壞他人之自由，並且不能只讓有權者有自由，真正尊重自由應該是「請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義許多禮物向強者獻媚！」（陳獨秀1984a: 172）。陳獨秀如此非難並為非基督教運動辯護的同時，沒有走向另一個極端，只是注重弱勢者的權利，他在〈對於非宗教同盟的懷疑及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警告〉中一如既往地對群眾中非理性的因素保持警惕和糾偏，引導運動朝理性方向發展（陳獨秀1984b）。

和軍國主義叫「割據」，不能叫「分立」（陳獨秀1984c）。直到1921年，還說今日的倫理有二：「一種是幫助弱者，抵抗強者，一種是犧牲弱者，幫助強者」。軍國主義就是後一種，社會主義與之相反是前一種（陳獨秀1984c）。這與作者強調1919年以後陳思想激進化差得有點遠。

以此再來審視作者之前對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的解讀也有問題，作者認為陳獨秀主張直接民主，是為陳獨秀後來「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提供思想之準備」（周麗卿2016: 200）。然而這只是後見之明，此時在陳的邏輯中代議制和直接民主並不是對立的，所謂代議制也不能盡廢，而代議制本身也是在執行民意。從現代政治理論來看，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也不是截然對立的，所謂の間接民主就是通過「代議士」進行公共選擇，所謂的直接民主是指公民以多數決定的方式形成公共決議。但是直接參與也是要講規則，要走程序的（秦暉2013: 90）；民主不是「廣場狂歡」、「集體暴政」、「大鳴大放」，若然，民主與專制沒有區別。所謂的「代議士」不過是執行決策而已，陳獨秀在〈實行民治的基礎〉中說：「用代議制照憲法的規定執行民意」（陳獨秀1919），說明此時他認為兩種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這時期他還明確表明不渴望階級鬥爭，更非普羅大眾主義、民粹主義了。

當然，這麼說不是否定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以後的思想轉向，而是要表明陳獨秀在五四後期的思想依然處於不明狀態，有一種混雜性，並非作者講得那麼強勢。正如歐陽哲生所言：「他為追蹤世界大勢，不斷調整自己的思想坐標，其思想發展的自我否定一個接一個，但他的每次轉變都是不徹底的，一個時期中，一種思想占主導地位，又有舊思想的殘餘和新思想的萌芽，結果是繼承未吸取精髓，創造沒有建立獨立的思想體系，拋棄又藕斷絲連，這就使得他的思想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混雜性」（歐陽哲生2012: 201）。

五、存疑之三：制度與文化，孰輕孰重？

作者在書中談到1920年代初胡適思想轉變時很強調胡適是「談政治」

的，也提到胡適注意到制度與文化間有著相輔相成之關聯，即「政治與文化在胡適當年看來，正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密切關係」，但是在作者的邏輯中依然更強調胡適「談政治」的一面（周麗卿2016: 12-15, 295-310），即如之前所言「但相對的也似乎遠離他當初堅持的文學革命的道路」。筆者不贊成將胡適等人視為「文化決定論」者（朱學勤1999: 220-228），抑或說「好人政府」是一種烏托邦主義（許紀霖2000: 304-322），而是承認胡適思想中文化與制度是相輔相成的，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便是「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胡適2013n）。但是筆者認為在這兩者之中胡適還是側重「文化」這一面的，即便是1920年代初「談政治」熱時亦是如此。這不是筆者主觀臆斷，而是根據史實的。

作者沒有充分注意到胡適在《努力周報》上答讀者疑問時所說的話。胡適在答梅光迪時說他談政治是與他的思想是一致的，梅光迪說胡適談政治遠遠勝過談白話文和實驗主義，胡適說這是錯的，他談政治只是踐行他的實驗主義，正如談白話文也是如此。「我現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一種『注重事實。尊重證驗』的方法」（胡適2013m: 324）。胡適說他從來沒有「變節」，他的態度是始終一致的，只是材料和實例變了而已。在答王秋伯和傅斯稜兩位讀者的來信時，胡適不同意他們的要求和責備，即不談文學專門談政治。

胡適特意說：「這種主張，我們便不能心服了」。胡適認為政治不過是努力的一個方向而已，《努力周報》並不是專談政治的。「談政治」只是因為時勢所逼迫的，但是不放棄思想文藝方面，我們的希望在於「討論活的問題，提倡活的思想，介紹活的文學」，並且明確說：「我們至今還認定思想文藝的重要」，中國當前的病根不在於軍閥和官僚，而是「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真仇敵！」（胡適2013n: 326-330）壞思想文化是壞政治的惡根，只是因為政治現在太壞才忍不住先打擊它一下，「但我們絕不可以忘記這二千年思想文藝造成的惡果」。壞政治固然要打倒，但是打倒千年思想文藝中

的「群鬼」更重要。

在似乎很「談政治」（周麗卿2016: 304）的〈這一週〉中也有此表示，胡適贊成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蔡先生正義的呼聲「時時起來，不斷的起來，使我們反省，使我們『難為情』，使我們『不好過』」，並且「不合作主義」具有積極的意義，蔡先生的「有所不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同流合污，這種狂狷不羈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養的基礎。「有所不為」也是「一種犧牲的精神」，若有所求就必須要有所犧牲的決心。並進一步認為：

在這個豬仔世界裡，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犧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胡適2013o, 2013b: 102-103）

〈這一週〉中有許多「談政治」的內容，但是在之後胡適等人的回顧中這段話卻再度被提起，這足以說明他對思想文藝的重視。所以他又說：在國民思想上多下些功夫，然後再能談政治改革，《努力》以後的新方向是思想的革新。「如果《新青年》能靠文學革命而不朽；《努力》將來在中國的思想史上占的地位應該靠這兩組關於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評，這是我敢深信的」（胡適2013p: 354-355）。胡適為《新青年》談了政治而中斷思想文藝事業而感到可惜，若《新青年》堅持做文學思想革命事業，必定影響不小。《努力》就是要繼承《新青年》的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為中國政治打下可靠的思想文藝基礎（胡適2013q: 358）。⁴

又如作者談到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時不贊成以往的說法，即胡適不贊成運動，認為胡適在談五四運動時，是贊成學生干預政治的，五四運動是以非政治勢力解決現實政治問題（周麗卿2016: 299）。筆者認為胡適當然不是完全反對學生運動的，甚至有時是支持的。但是如前文所言，胡適

4 日後在為重印的《新青年》題詞也是高度肯定它在文學運動和思想改革方面的價值（胡適2013c: 667）。胡適後來在紀念五四運動時曾表明五四運動並不是孤立的，它應當包括「五四」前後的各種新思潮運動。是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在先，五四後的各種新文藝活動、政治活動在後。在三篇紀念五四的文章中都提到，社會運動的變化都有賴於思想的變化，個人沒有自由，思想無法轉變，社會政治都無從進步（胡適2013d, 2013a, 2013e）。

不放棄談政治，可強調的重點還是在思想改造的一面。筆者認為胡適和蔣夢麟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中固然有支持學生的一面，但是看完全文後就知道強調的還是反對學生過於參與政治，因為這容易養成依賴群眾、逃學、無意識的惡習，他們主張學生應該注重「課堂裡，自修室裡，操場上，課餘時間裡的學生活動。只有這種學生活動是最能持久又有效的學生運動」，「學生運動如果想要保存五四和六三的榮譽，只有一個法子，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學校內外有益有用的學生活動上去」（胡適2013f），並且對學生運動、群眾運動不容納不同意見、容易形成暴民專制抱有警惕，如前文說陳獨秀一樣，這是一種典型的自由主義的幽暗意識。⁵從這篇文章的形式上來講，肯定學生運動的部分只占一頁，對其警惕性的部分卻有五頁，並且肯定部分放在前面，警惕部分放在後面，中間加了轉折詞句「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顯然全文強調的是後半部分，不是作者說的前小半部分。至於作者所說的胡適對黃宗羲論政的贊賞、對閻錫山新政的肯定等，胡適在《努力》中回答已經有所說明，即在前文中說「談政治」只是因為時勢所逼迫而已，並且只是一個努力方向。

作者若是在意，就可以發現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前後具有一致性。在1925年五卅運動時胡適對五四運動評價時依然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但他還是認為群眾運動是不可持久的，民氣與政府相互聲援才能產生效力，政府不能運用民氣，則民衆運動大部分犧牲都被糟蹋。救國不是一朝一夕就是可以完成的，真正的救國是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裡跟著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可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裡，能立定腳跟，打定主意，

5 在此還可以舉出「談政治」期間，胡適注重理性表達另一個事例。在1923年六月的浙江一師投毒案中胡適依然堅持新思潮的態度為「評判的態度」，無論對什麼制度、信仰、疑難都不盲從、不武斷，用冷靜的眼光，搜集證據，尋求解決方法。一師的毒案中引發了各種謠言，但是一師依然保持理性的態度，靜候法庭偵查審判，「這一次奇慘奇嚴的試驗，一師至少可以說是及格了」。胡適接著說他對一師的希望在於，一是「繼續保持這種不武斷不盲從的態度」，「更渴望大家不要因為感情上的刺激，而忘了『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古話」。二是用評判之態度，來評判校內的制度，以謀求學校的改革和進步，改良弊病部分，保存有益部分（胡適2013g: 106-107）。

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胡適2013r: 572-576）。在回答讀者（劉治熙）對這篇文章的疑問時再度強化了這一點，說自己不是根本上否定群眾運動的作用，但是救國不是短時間中就能成功的，如今學生們所做的運動只可以短時間的存在，救國這種大事業要有遠大的準備，跟著別人亂跑只能是發發牢騷，出出氣，不是真正的救國。所以現在的青年學生應該注重有秩序的組織，要想干政，「應該注重學識的修養」，「我們期望個個青年學生努力多做點學問上的修養。第一不愧是個學生，然後第二可以做個學生的革命家」（胡適2013h: 109-110）。如在1920年時一樣，都是肯定性占少部分，警惕性占大部分。

1932年，胡適再次認為解決學潮的方法在於因勢利導，讓學生彼此尊重異己的主張，為言論自由負責，指出學生團體的缺陷，改善其組織，使得學生能參加有組織有訓練的生活（胡適2013i: 204-205）。在1935年時對政府壓制輿論進行批判、對學生進行了肯定後，又忍不住說了自己的忠告：即青年學生運動的目標在於以抗議的聲音來糾正或監督政府，而不是直接行動；青年學生要認清自身的力量，其組織活動建立在法治精神的基礎上，不能由少數人操縱；青年學生用正確的方法，一切學生活動「都應該含有教育自己訓練自己的功用」，要培養健全獨立的人格，不能盲從武斷。他並且再次強調青年學生要努力發展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社會的進步是一點一滴的進步，國家的力量也是靠這個那個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養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功夫」（胡適2013j: 609-610）。「群眾運動，有抗議的功用而不是實際救國的方法。青年學生認清了報國目標，均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有智識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國家的需要」（胡適2013k: 612）。在1947年答青年疑問時，胡適也認為救國不是吶喊和標語，他再度拾起1920年初時所說的話，「你想要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即要將自己鍛造成有用的人才，才可以有資格為國家社會盡力（胡適2013l: 742）。可見胡適始終強調都是後半部分即「思想」塑造方面。

日後胡適在其《口述自傳》中說學生運動是對文化運動的一種干擾（胡

適2006: 183)，將純粹的文學、文化、思想的文藝復興運動不久後就變成政治運動，固然有作者說的「摻雜日後兩岸分裂的歷史包袱與個人的政治立場」（周麗卿2016: 295-296），⁶但是胡適對「文化」的重視也由此可見一斑。作者有這種認識可以理解，就是為了凸顯本書政治、思潮與社會相互動這個核心主題，但不加分別、主觀放大史料的「政治性」的做法似乎不可取。

一些細節部分也應注意。例如措辭上，作者在書中是將「封建專制」並用，例如「回到民初中國，從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國家，甫改制為民主共和國」（*ibid.*: 21）、「兩者都指向帝制復辟的封建意識形態」（*ibid.*: 78）、「從封建王朝邁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艱難轉型」（*ibid.*: 331）。但是這種用法沒有考慮到「封建」的本意，「封建」在古漢語中本指「封邦建國」，主要是中國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而英文中的「feudalism」指的是歐洲中古式的采邑、封地制度（秦暉2003: 1），⁷「專制」指的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一統天下，就是中國從秦漢到明清的皇權專制制度。換句話說「封建」不可能「專制」，「專制」更是不允許「封建」，在特定情形下「封建」對擺脫「專制」還有積極意義，兩者矛盾，不能混淆並用。

本書拓寬了《新青年》研究的路徑，但是對時代背景鋪成不夠、對文本本身內容關注不足使其還有進一步的提升餘地。以後的研究中思想啓蒙闡釋的傳統路徑與思潮、社會互動的新路徑之間應有更多的「互動」，以深化對《新青年》的認知。

6 似乎也不完全是，在〈五四運動是青年的愛國運動〉中胡適否定五四運動是由中共領導的，認為這是沒有史實根據的笑話，那時共產黨還沒有成立。他認為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完全是青年人愛國思想暴露」。他一面說學生運動的干擾性，一面也說其對思想文藝復興運動有幫助，胡適與以前紀念「五四」一樣，依然肯定其在思想革新方面的作用（胡適2013s: 775-780）。

7 關於「封建」一詞詳細的流變，可以參見馮天瑜（2006）的《「封建」考論》一書。

引用書目

- 卞悟 (Bian, Wu) 。1997。〈列寧主義：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化〉“Liening zhuyi: e'guo shehui minzhu zhuyi de mincui zhuyihua” [Leninism: Populism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二十一世紀》*Ershiyi shiji* [Twenty-First Century] 43: 37-47。
- 王汎森 (Wang, Fan-Sen) 。2001。〈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的兩個例子〉“Sichao yu shehui tiaojian: xinwenhua yundong de liangge lizi” [Ideological Trends and Social Conditions: Two Example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收錄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系譜》*Zhongguo jindai sixiang yu xueshu xipu* [Modern Chinese Thoughts and Academic Pedigree]，頁220-262。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 (Hebei Education)。
- 朱學勤 (Zhu, Xue-Qin) 。1999。〈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Zai wenhua de zhifang shang saoyang” [Scratch the Fat of Culture]。收錄氏著《思想史上的失蹤者》*Sixiangshi shang de shizongzhe* [Missing Persons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s]，頁220-228。廣州 (Guangzhou)：花城 (Huacheng)。
- 汪暉 (Wang, Hui) 。2009。〈文化與政治的雙重變奏：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Wenhua yu zhengzhi de shuangchong bianzou: zhanzheng, geming yu yijiuyiling niandai de sixinagzhan” [The Double Variation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War, Revolution and "Ideological War" in 1910s]。《中國社會科學》*Zhongguo shehuikexu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117-207。
- 。2011。〈革命、妥協與連續性的創制〉“Geming, tuoxie yu lianxuxing de chuangzhi” [Revolution, Compromise and Creation of Continuity]。收錄於《舊邦新造》*Jiubang xinza* [Old State, Newly Built]，章永樂 (Zhang-Yong Le) 著，頁1-23。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 。2015。《短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革命的邏輯》*Duan ershi shiji: zhongguo zhnegzhi yu geming de luoji*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The Logic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Revolution]。香港 (Hongkong)：牛津大學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周麗卿 (Chou, Li-Ching) 。2016。《探索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新青年〉與民初政治、社會思潮》*Tansuo xiandai zhongguo de zhengzhi zhuanxing: xinqingnian yu minchu zhnegzhi shehui sichao*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New Youth an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s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臺北 (Taipei)：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s)。
- 林宏志 (Lin, Chih-Hung) 。2009。《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

民》 *Minguo nai diguoye: zhengzhi wenhua zhuanxing xia de qingyimin* [*The Chinese Republic as Enemy: Qing Loyalists in a Shifting Political Culture*]。臺北 (Taipei)：聯經 (Linking)。

- 胡適 (Hu, Shih)。2013a。〈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再談五四運動)〉“Geren ziyou yu shehui jinbu (zaitan wusi yundong)” [Personal Freedom and Social Progress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 *Hushi wenji shiyi hushi shilunj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h 11: The col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of Hu Shih*]，歐陽哲生 (Ou Yang, Zhe-Sheng) 編，頁534-538。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 。2013b。〈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Caiyuanpei yu beijing jiaoyujie” [Chai Yuan-pei and Beijing academia]。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102-104。
- 。2013c。〈《新青年》重印題辭〉“Xinqingnian chongyin tici” [Reprinted inscription of New Youth]。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667。
- 。2013d。〈紀念「五四」〉“Jinian wusi” [In memo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523-530。
- 。2013e。〈「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Wusi de diershiba zhounian”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733-736。
- 。2013f。〈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Women duiyu xuesheng de xiwang” [Our Hope for Students]。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44-50。
- 。2013g。〈一師毒案感言〉“Yishi du'an ganyan” [Comments on the First Normal College Drug Case]。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106-110。
- 。2013h。〈劉治熙《愛國運動與求學》的來信附言〉“Liu Zhi-xi aiguo yundong yu qiuxue de laixin fuyan” [A postscript to a letter from Liu Zhi-xi's Patriotic Movement and Learning]。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109-110。
- 。2013i。〈論學潮〉“Lun xuechao” [Comments on the student's strikes]。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204-209。
- 。2013j。〈為學生運動進一言〉“Wei xuesheng yundong jinyiyan” [A word for student's strikes]。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607-610。
- 。2013k。〈再論學生運動〉“Zailun xuesheng yudong” [Further Discussion on

- Student's strikes]。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609-614。
- 。2013l。〈青年人的苦悶〉“Qingnianren de kumen” [The anguish of young people]。收錄於《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頁740-744。
- 。2013m。〈我的歧路〉“Wo de qilu” [My crossroads]。收錄於《胡適文集3：胡適文存二集》*Hu shi wenji san Hu shi wencun erji*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h 3: Saved articles of Hu Shih II]，歐陽哲生編，頁322-326。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
- 。2013n。〈我的歧路·附錄二〉“Wo de qilu fulu er” [My crossroads · Appendix 2]。收錄於《胡適文集3：胡適文存二集》，頁326—330。
- 。2013o。〈這一週〉“Zhe yizhou” [This week]。收錄於《胡適文集3：胡適文存二集》，頁407-410。
- 。2013p。〈一年半的回顧〉“Yinianban de hugu” [A year and a half ago]。收錄於《胡適文集3：胡適文存二集》，頁351-355。
- 。2013q。〈與一涵等四位的信〉“Yu Yi-han deng siwei de xin” [Letters with han and three others]。收錄於《胡適文集3：胡適文存二集》，頁358。
- 。2013r。〈愛國運動與求學〉“Aiguo yundong yu qiuxue” [Patriotic Movement and Study]。收錄於《胡適文集4：胡適文存三集》*Hu shi wenji si hu shi wencun sanji*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h 4: Saved articles of Hu Shih III]，歐陽哲生編，頁572-576。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
- 。2013s。〈五四運動是青年的愛國運動〉“Wusi yundong shi qingnian de aiguo yundo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a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youth]。收錄於《胡適文集12：胡適演講集》*Hu shi wenji shier hu shi yanjiang ji*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h 12: Hu Shih's Lectures]，歐陽哲生編，頁775-780。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
- 胡適（Hu, shih）口述，唐德剛（Tang, De-Gang）譯注。2006。《胡適口述自傳》*Hu shi koushu zizhuan* [Hu Shih's Oral Autobiography]。桂林（Guilin）：廣西師範大學（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 秦暉（Qin, Hui）。2003。《傳統十論》*Chuantong shilun* [Ten discussions about tradition]。上海（Shanghai）：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
- 。2013。《共同的底線》*Gongtong de dixian* [Shared Bottom Line]。南京（Nanjing）：江蘇文藝（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2015。〈重論「大五四」的主調，及其何以被「壓倒」〉“Chonglun dawusi de zhudiao, jiqi heyi bei yadao” [Re-discussing the Main Ton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Why It was 'Overwhelmed']。《二十一世紀》*Ershiji*

shiji [Twenty-First Century] 150: 19-35。

- 。2017。〈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坐標〉“Yijiuyiqi nian e'guo shiyue geming de lishi zuobiao” [The Historical Coordinates of Russia's October Revolution in 1917]。《二十一世紀》*Ersbiyi shiji* [Twenty-First Century] 163: 4-23。
- 高一涵 (Gao, Yi-Han)。1915。〈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Gonghe guojia yu qingnian zhi zijue” [Republican State and Youth Consciousness]。《青年雜誌》*Qingnian zazhi* [Youth Magazine] 1。
- 商昌寶 (Shan, Chang-Bao)。2015。〈直面批判，正本清源：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辯護〉“Zhimian pipan, zhengben qingyuan: zaiwei wusi xinwenhua yundong bianhu” [Confront Criticism and Start from the Root: Defending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名作欣賞》*Mingzuo xinshang* [Masterpieces Review] 34: 61-67。
- 張朋園 (Zhang, Peng-Yuan)。2015。《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Congminquan dao weiquan: sunzhongshan de xunzheng sixiang yu zhaunzhe jianlun dangren jizhi shushi* [From democracy to authoritarianis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telage in Sun Yat-sen and his followers]。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許紀霖 (Xu, Ji-Lin)。2000。〈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和「好人政府」論戰〉“Zhongguo ziyouzhu yi de wutuobang: Hu shi he haoren zhengfu lunzhan” [Utopia of Chinese Liberalism: Debate between Hu Shih and “Good People Government”]。《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 (上)》*Ersbi shiji zhongguo sixiangshi lun (sha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in the 20th Century I], 許紀霖編，頁 304-322。上海 (Shanghai)：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 陳獨秀 (Chen, Du-Xiu)。1915。〈東西民族根本思想差異〉“Dongxi minzu genben sixiang chayi” [The Fundamental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Nationalities]。《青年雜誌》*Qingnian zazhi* [Youth Magazine] 1。
- 。1919。〈實行民治的基礎〉“Shixing minzhi de jichu” [The Foundation of Implementing People's Governance]，《新青年》*Xinqingnian* [New Youth] 7。
- 。1921。〈隨感錄·一一八〉“Suiganlu yiyiba” [Random Notes ·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新青年》*Xinqingnian* [New Youth] 9。
- 。1984a。〈致周作人、錢玄同諸君信〉“Zhi zhouzuoren, qianxuantong zhujun xin” [Letter to Zhou Zuoren, Qian Xuanton et al.]。收錄於《陳獨秀文章選編 (中)》*Chen Du-xiu wenzhang xuanbian (zhong)* [Selected Articles of Chen Du-xiu II]，頁 172。北京 (Beijing)：三聯 (SDX) Joint

- Publishing)。
- 。1984b。〈對於非宗教同盟的懷疑及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警告〉“Duiyu fei zongjiao tongmeng de huaiyi ji fei jidujiao xuesheng tongmeng de jinggao” [Doubts about Non-religious Alliance and Warnings of Non-Christian Student Alliance]。收錄於《陳獨秀文章選編（中）》，頁179-180。
- 。1984c。〈女子問題與社會主義〉“Nuzi wenti yu shehui zhuyi” [Women's Issues and Socialism]。收錄於《陳獨秀文章選編（中）》，頁104。
- 。1984d。〈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Chaoxian duli yundong zhi ganxiang” [Reflections on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收錄於《陳獨秀文章選編（上）》*Chen Du-xiu wenzhang xuanbian (shong)* [Selected Articles of Chen Du-xiu I]，頁365。北京（Beijing）：三聯（SDX Joint Publishing）。
- 。1984e。〈爲什麼南北要分立〉“Weishenme nanbei yao fenli” [Why should the North and South be separated]。收錄於《陳獨秀文章選編（上）》，頁368。
- 馮天瑜（Feng, Tian-Yu）。2006。《「封建」考論》*Fengjian kaolun*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Feudalism]。武漢（Wuhan）：武漢大學（Wuhan University）。
- 歐陽哲生（Ou-Yang, Zhe-Sheng）。2012。〈陳獨秀與胡適思想之比較研究〉“Chen Du-xiu yu Hu shih sixiang zhi bijiao yanji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en Du-xiu's and Hu Shi's Thoughts]。收錄氏著《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Wusi yundong de lishi quanshi*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頁171-201。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
- 羅志田（Luo, Zhi-Tian）。2006。《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Jibian shidai de wenhua yu zhengzhi: cong xinwenhua yundong dao beifa*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Aggravated Times: From New Cultural Movement to Northern Expedition]。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
- 。2014。〈陳獨秀與「五四」後《新青年》的轉向〉“Chen Duxiu yu wusihou xinqingnian de zhuanxiang” [Chen Du-xiu and the Turn of New Youth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收錄氏著《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Dao chu yu er: guodu shidai de xinjiu zhizheng* [Tao Comes from Two: The Debate between Old and New in Transitional Times]，頁180-197。北京（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羅崗（Luo, Gang）。2015。〈1916年：民國危機與五四新文化的展開〉“Yijiyuliu: minguo weiji yu wusi xinwenhua de zhankai” [1916: The Crisi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May 4th New Culture]。收錄氏著《預言與危機》*Yuyan yu weiji* [*Prophecy and Crisis*]，頁24-37。杭州（Hangzhou）：浙江大學（Zhejiang University）。

蘇文（Su, Wen）。1997。〈傳統、改革與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再認識〉“Chuantong, gaige yu geming: yijiuyiqi nian e'guo geming zai renshi” [Tradi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Reconsideration of the 1917 Russian Revolution]。《二十一世紀》*Ershiyi shiji* [*Twenty-First Century*] 43: 4-16。